

关于“战时共产主义”评价的问题

唐士润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期间，即1918年夏至1921年春，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于这个时期政策的评价，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史学界都有不同的见解，有全盘否定的，也有全部肯定的。到底应当怎样对它进行科学的评价，这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何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有着重大的意义。笔者认为，列宁是“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行者，在情况变化后又是坚决抛弃它而改行新经济政策的首倡者和领导者，他对这段历史有过多方面的论述，因此，应从历史实际出发，全面地理解列宁的观点，才能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功过进行科学的分析。本文试图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因

有人认为：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开始搞“战时共产主义”，即使没有战争环境，也同样会有所谓“战时共产主义”，不同的只是无需加上“战时”二字而已^(注)。这种见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歪曲了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因。

1918年夏天前，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是“战时共产主义”么？不是。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对过渡时期的阶段就有明确的论述。他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统计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走上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十月革命后，列宁又指出：

“在我们的理论文献中就明确地强调，即使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道路，也必须经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统计和监督的过渡时期，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时期(资本主义愈不发达的社会，所需要的过渡时期就愈长)”(《列宁全集》33卷43页)。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的主要经济措施和十月革命后在经济方面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建立工人的监督，并且颁布了《工人监督条例》。当时，苏维埃国家为了控制经济命脉，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只是逐步地把国家银行、垄断企业、部份大型工矿企业、交通运输、外贸收归国有。到1918年5月31日止，收归国有的企业有512个，只占三千多注册企业(不包括中小企业)的六分之一。因此，这个时期不仅保留了全部私营中小企业，而且保留了大部分私营大企业。

列宁认为，这段时间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列举了这个期间颁布的广告垄断法令和银行法令说明政策的正确性：“在1917年颁布的头一批法令中，有一条关于国家对广告实行垄断的法令。这条法令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取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想尽可能逐步地过渡到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不取消私人报刊，而使私人报刊在某种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把它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规定国家对广告实行垄断的法令，是想保留作为一般现象的私营报纸，保留需要私人广告的经济政策，也保留私有制，即保留许多需要刊登广告的私人企

业。”（《列宁全集》33卷67页）银行法令也与此类似，开始只将国家银行收归国有，对全部私营银行实行监督，后来私营银行不服从国家监督，才宣布实行国有化。当然，列宁也曾指出，这段时间国有化速度还稍快了点，管理跟不上。

1918年3月，当苏俄摆脱贫帝国主义战争后，列宁就把注意力移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造和建设方面。他在《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当前的迫切任务不是剥夺剥夺者，而是组织对俄国的管理；要在经济上进行适当的“退却”或“妥协”，应当马上“停止一下”进攻；要在一切企业中组织统计和监督；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组织竞赛；要重视农民经济；要对资产阶级专家付给高额酬金；采用泰罗制的许多科学的进步的因素，组织托拉斯；“着重指出个人的、单独的、专人的负责制的意义和这一因素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指出国家管理与建立政权的政治任务 and 军事任务的不同之处。”（《列宁全集》33卷42页）列宁还在批判“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时，提出了苏维埃国家存在五种经济成分的著名论断，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在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从十月革命到1918年夏天这段历史，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准备或推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历史，而是渐进的缓慢过渡的历史。正如列宁后来在回顾时所说：“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原打算实行一系列渐进的改变，比较慎重的过渡到新制度。”（《列宁全集》33卷70页）这种渐进而缓慢的过渡的政策，由于时间短暂，虽然还不完善，但如果不是资产阶级用战争来对抗，不仅不加“战时”二字的“共产主义”政策不可能发生，而且此政策会在实践中更加具体和完善的。

然而，正当苏维埃政权致力于缓慢过渡的时候，国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起来发动了残酷的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斗争越艰巨，实行慎重过渡的可

能性就越小”（《列宁全集》33卷70页）。苏维埃国家被迫放弃了原来的政策，而采用适合战争的经济政策。

列宁再三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列宁全集》32卷333页）它是“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采用的……”（《列宁选集》4卷516页）。

1918年5月末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在西北利亚叛乱，英法军队早些时候在北方登陆，英军在巴库登陆，德军乘机进入了乌克兰和外高加索，日美军队在远东登陆。在帝国主义的纵容和金钱支持下，国内地主、资产阶级、富农、白卫军官、哥萨克上层和反动政党头目集合在一起，在首都和全国各地城乡暴乱，分别形成了以高尔察克（在东方）、邓尼金和克拉斯诺夫（在南方）、尤登尼奇（在西北）、弗兰格尔（在西南）、谢苗诺夫（在贝加尔湖）等为头子的几十万反动军队，在各地建立起形形色色的反动政府——“萨马拉政府”、“北方政府”、“西北利亚政府”等。反动军队所到之处，攻城掠地、烧杀抢劫、破坏经济。敌人从四面八方苏维埃政权扑来，国家处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正如列宁所说：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问题这样摆着的：我们处在战争之中，革命的命运取决于这一战争的结局。”（《列宁全集》28卷13页）

面对着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发动的战争，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状况怎样呢？已经遭受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破坏的俄国经济，这时“处于空前未有的破产情况”（《列宁全集》32卷222页）。

工业总产值以战前不变价格计算，1918年只有186000万卢布，相当于战前29.1%。农业状况更加惨重，劳力不足战前的一半，播种面积和产量下降，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严重困难。国家财政收入也锐减，1918年只有9970万卢布，相当于战前5.8%。这就是苏维埃国家接收过来的残破不堪的国民经济和民穷财尽的烂摊子。当国内战争爆发后，由

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功劳是主要的

于敌人很快占领了乌克兰、乌拉尔、西北利亚、顿巴斯、顿河流域和库班等大片粮食、原料、燃料产地，截断了交通，使首都中央地区与之隔绝，造成停产，粮食和生活用品短缺，通货膨胀，工人流散，人民挨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国家怎样才能承担起支持战争和对居民的起码供应呢？列宁指出：

“我们必须敢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不怕采取非常措施。”（《列宁选集》4卷526页）这就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因和客观因素。

当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也有主观认识上的一些因素。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在群众革命热情浪潮的推动下，胜利地解决了建立政权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也想直接用这种热情来解决伟大的经济任务，因而头脑显得不冷静和不谨慎；由于缺乏经验，象乃木将军攻击旅顺那样，想用“正面冲击”来试探一下能否拿下敌人的要塞（资本主义经济）；领导成员中有模糊地假设的不很确切的“直接过渡”的思想影响；共产党人流行的害怕商业、货币、市场的偏见以及想把党纲中拟定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可以立刻实现的东西先建立起来”（《列宁选集》4卷617页）。这些认识上的因素也促进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1918年夏天，苏维埃政权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九月二日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统一军营，宣布实行红色恐怖，加强肃反，成立列宁为首的工农国防委员会，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和普遍义务劳动制，实行余粮收集制，工业和贸易全部国有化，禁止任何贸易，消灭了商业，按阶级和劳动强度尽可能平均分配粮食和生活必需品，货币作用消失，经济实物化。以上措施，既带有一切为战争的特点，又带有“共产主义”的特点，因而史称“战时共产主义”。

国外有些人攻击“战时共产主义”是“荒谬绝伦的”、“给自己带来毁灭”。考茨基之流攻击它是士兵的“消费共产主义”。我国也有人否定它的历史功绩，说它是农业社会主义的变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注）。敌人的攻击和我们内部完全否定的意见，其性质虽然根本不同，但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应该历史地、辩证地来评价这段时期的政策。

列宁曾多次指出：作为临时措施，特殊政策，“在我们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列宁全集》32卷222页）这就是说功劳是主要的。他愤怒地斥责攻击这个政策的人时说：“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考茨基之流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过错时，他们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走狗的作用。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列宁选集》4卷517页）那末，它有哪些方面的功劳呢？

第一，使苏维埃国家能迅速组织起五百万军队和全国劳动者同敌人作战，捍卫住工农政权。当时，红军刚建立，人少军事素质弱。国家宣布全国为统一军营，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加紧征兵和训练，到1918年6月，红军扩大到50万人，年底达到100万人，随着战争继续进行，红军曾扩大到约500万人。在三年残酷的内战中，红军在四面八方同白匪军和外国干涉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尽管红军武器装备破劣，供应困难，常常缺衣少食，但由于明白自己在为保卫工农政权而战，为自己免遭地主、资本家再次奴役而战，因而表现出了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要能战胜强敌，只有军事战线的努力是不够的，还要有后方劳动战线的共同努力。“红军所需要的只是男子，而现在需要投入

劳动战线的却是国内的全部劳动力，包括男子、妇女、甚至未成年的人。”（《列宁全集》30卷481页）1918年10月，国家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在大城市实行劳动手册，强迫剥削阶级分子参加劳动，这就把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组织了起来，安排到最需要劳动力的工矿企业为前线而紧张地劳动。列宁赞叹说：“在劳动战线也象在流血战线一样，创造出空前的奇迹。”（同上）广大后方人民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在劳动中表现出了自我牺牲精神和铁的纪律。在反高尔察克斗争中，莫斯科铁路工人还创造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自愿加班加点，不计报酬地多干工作。正是前方红军的浴血奋战和后方工人的忘我劳动，经过三年激烈的战争，终于战胜了国内外反动势力，保住了工农政权。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可以忍受半饥饿、甚至比半饥饿更坏的生活，但我们无论如何要捍卫住工农政权，尽管有闻所未闻的经济破坏和缺乏流转，我们也要捍卫住工农政权。”（《列宁选集》4卷526页）这是一个确定不移、不容抹杀的根本性功劳，不管人们怎样攻击都不能改变这个客观历史事实。

第二，能高度集中统一领导国民经济，使它服从战争的需要。列宁说：“我们的军队最需要供应衣服、靴鞋、武器和炮弹。在遭到破坏的国家里，必须作巨大的努力才能满足军队的这种需求。”（《列宁选集》4卷27—28页）苏维埃国家用法令把全部工业、贸易、交通运输都实行国有化，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设立70多个“总局”，直接领导全国各系统四千多个工厂的生产，这样国家就能集中全国的资源、人力、物力、财力，按战争需要组织国防生产和其他生产，并控制全部有限的产品保证红军的需要。据统计，三年内战期间，为红军提供了约15亿发子弹，250万支来福枪，21000挺机枪，3973门炮，800万发炮弹，160万发榴弹炮炮弹。此外还修复了大量的枪枝、大炮、装甲车等。1919年至1920

年，给红军提供了560万件军大衣，400万件夏季服装，2000万件衬衣，1000万多双军靴。这些武器装备和物资，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条件。

第三、拯救了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在国内战争期间，“‘饥饿战线’是仅次于军事战线的重要战线”。（《列宁全集》31卷158页）当时人民挨饥受冻，挣扎在饥饿线上，而苏维埃国家又是经济破坏，财政崩溃，拿不出等价产品或等值货币与农民交换粮食。为了供应红军的粮食和把广大城市人民从饿死境地拯救出来，苏维埃政权只好采取余粮收集制。这是“战时共产主义”的主要措施。列宁说：“我们没有其他可能性，而只有立即实行最大限度的垄断，直到甚至不给任何报酬地取得全部余粮”（《列宁全集》32卷222页）。“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供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因为付的都是纸币。我们当时不这样就不能在这经济破坏的小农国家内战胜地主和资本家”。（《列宁选集》4卷517页）

余粮收集制开始只是谷物和饲料，后来扩大到主要农副产品。根据统计，收集到的谷物和饲料：1918—1919年为10790万普特，1919—1920年为21250万普特，1920—1921年为36700万普特；肉类（活重）1918年为1215百吨，1919年为1713百吨，1920年为8642百吨；马铃薯1919—1920年为4230万普特，1920—1921年为7000万普特；其他还有大量的油脂、奶类、家禽、棉花、羊毛、畜皮、蔬菜等。收集这样大量的农副产品，对残破的农业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正如列宁所说：“余粮收集制不是‘理想’，而是一种痛苦的和可悲的需要。”（《列宁全集》32卷311页）这是工农政治军事联盟的需要。它的基础是农民从苏维埃政权获得土地，并保护其免遭地主资本家迫害，工人从农民那里借来了粮食。这亦是战争期间农民能忍受余粮

收集制的基本原因。

国家在取得粮食和农副产品后，除大部分供应红军外，由粮食人民委员部和消费公社集中统一分配，按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和生理需要尽可能平均地分配给城市劳动者，尽管半饥半饱，却免于饿死。这是余粮收集制的主要积极因素。考茨基之流攻击“战时共产主义”是“完全忽视经济条件”、“崇拜暴力”、分光吃光的士兵的“消费共产主义”。列宁驳斥道：“在一个国家被战争弄得民穷财尽而濒于灭亡的时候，首要的、基本的、根本的‘经济条件’是拯救工人。只有工人阶级得救，不致饿死，不致毁灭，被破产的生产才能恢复”。“‘消费共产主义’是拯救工人的条件。为了拯救工人，要不惜任何牺牲！”（《列宁全集·29卷360—361页）离开当时具体历史条件，指责不拿工业品与农民搞等价交换，指斥搞平均主义分配，这是不可取的“绝顶聪明”的妙论。

总之，“战时共产主义”的历史功劳是基本的或主要的，尽管它是很严厉的，要求全国人民作出的个人牺牲如此巨大，但是，为了同国内外反动势力作殊死斗争，为拯救国家、拯救人民、拯救社会主义革命、保卫工农政权，数千万人民不惜倾家荡产，不惜抛妻弃子和牺牲个人生命，忠诚而勇敢地为之奋斗，在前方后方都创造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确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难道不应给它以应有的肯定吗？

“战时共产主义”的严重错误和深刻教训

我们不是肯定一切，只是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战时共产主义”也还有严重的错误和消极的一面。但是有些人不承认它有严重的错误，甚至把它“理想化”，如苏共党史称它是“唯一可行的”和“完全正确的”

政策，有人赞扬它是“对未来的预见”，托洛茨基等人还认为它是无产阶级“唯一可行的长期经济政策”（注）。我国史学界也有人不承认它犯有“直接过渡”的严重错误。列宁对把“战时共产主义”“理想化”、回避和掩饰其错误的人，同样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对“战时共产主义”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要求各国无产阶级注意这些教训。可惜列宁的论述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我们认为：“战时共产主义”只是特殊条件下的“临时措施”，不是经济条件需要所引起的、不是也不可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不是圆满成功的，功劳是“有限度”的，在执行中犯有“过急”、“过分”、“偏差”的错误，没有掌握一定的限度，做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事情。不承认和不正视这些严重错误，如同不承认它应有的功劳一样，同样是不正确的。

列宁在论述“战时共产主义”时指出：“在施行一定的政策时有过错误，有很多过分的地方”（《列宁全集》32卷222页）。“我们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周转方面做得太过分了”。“在这方面，我们做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事情；我们没有保持一定的限度，不知道如何保持这个限度，——如果不看到这点和不理解这点，那就是莫大的罪恶了”。（《列宁全集》32卷208页）具体说来，“战时共产主义”有哪些错误呢？

第一，工业国有化做过了头，超过了所需要的限度，扩大了打击面。应该看到，苏维埃国家在当时只需要把国防工业和对国民经济有决定意义的大型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大银行收归国有，控制住国家经济命脉，组织起国防生产和供应就够了。让广大中小企业在国家的监督 and 指导下，为战争和人民生活而主动地积极地经营自己的企业，这对国家、人民和个人都是有益的。可是，在工业化早已完成，战争临近结束时（1920年11

月),苏维埃国家又宣布把五人以上的中小企业,甚至不少手工业都国有化。名为消灭资产阶级,实际上把相当多的小资产阶级当成资产阶级,这就混淆了矛盾性质,引起了小资产阶级的不满。这样的结果,经济效果很差,中小企业的生产十分困难,造成地方日用工业品奇缺,经济困死。

在工业管理上实行“总局”制领导,除积极作用外,也暴露出严重的问题:管理过分集中,大中小企业使总局负担过重;造成中央和地方隔离,地方当局和企业本身不关心经济活动的效果;特别是由于无专人负责漫无边际的集体领导的管理体制和取消经济核算,造成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因循守旧泛滥。在1920年俄共(布)“九大”上,列宁就建议改革这种管理体制,实行“一长制”。这种过分集中,统得过死的管理方法,给当时和后来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第二,在贸易国有化和禁止商品流转方面,做得太过分了。内战爆发不久,国家宣布把一切大中小商业国有化,禁止私人贸易和任何商品交换。1919年3月,宣布了成立消费公社,将全部居民编入公社的分配站,把商店,小铺,仓库都交给公社使用,粮食和日用品免费分配给每人,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分配网代替私营商业网。下半年又在大城市开始举办公共食堂,到战争结束时约有300万人在公共食堂免费吃饭。这样实际上消灭了货币,实行了经济实物化。这种把流转堵得死死的僵硬的做法,超越了阶段,违反了经济规律,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生活,使国家经济感到窒息。正如列宁指出的:“地方农业和地方工业在地方范围内有一定的周转自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允许地方上的自由周转,这不仅不会破坏,而且会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列宁全集》32卷208页)正是由于以上过火的绝对化的做法,给苏维埃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工农业之间的正常联系被堵死,使工农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日常生活来源愈来愈少,商业市场出现了禁而不绝,关而不停,投机商贩猖獗,“黑市”迅速蔓延的情况。

笔者认为,正确的政策应该是,在国家控制主要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的前提下,允许工农业产品的周转自由,并且保护这种国家监督下的合法市场,利用市场调节生产的积极作用,同时保留货币作为一般商品的作用。这样,即使国家获得的商品不很多,然而把它投入市场周转,又允许农民、手工业者和中小企业在完成国家交售任务后把多余产品投入市场周转,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就能鼓励农民、手工业者和中小业主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增加生产和活跃经济较为有利。

第三,企图“直接过渡”的作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列宁直率地承认:我们原打算(或更确切些说,我们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列宁全集》33卷39页)“当时我们认定,农民按照余粮收集制会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而我们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我们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不能说我们就是这样明确地给自己拟定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当时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动的。不幸这是一个事实。我说不幸,是因为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时期终于使我们相信,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列宁全集》33卷4页)余粮收集制作为临时措施起过养活工人的历史作用,但是在执行中的过火行为和用它来“直接过渡”,就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它破坏了工农业之间的正常联系。国有化的经济没有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使农民失去任何个人物质利益、个人兴趣,因而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同时,收集粮食过程中的过火行为也引起农民、特别是富裕农民的强烈不满。因为征粮队在计算农户的播种面积、产量和牲畜头数时,往往不够准确

和偏高，当农民交不够粮食时就逐户搜缴，有时与农民发生冲突。于是国家只好通过地方粮食机关、带枪的征粮队、革命法庭来执行这个政策。而一些农民则用减少播种面积和隐瞒产量来对付这个政策。

那么在战争严重破坏，国家不可能与农民进行等价交换的情况下，余粮收集是否有改进的方法呢？笔者认为有的，就是政府在每年播种前向农户下达义务交售余粮的份额，收获后在完成交售份额后，其余农副产品由农户自由支配，可到市场出售。如遇灾害，可酌情减免交售数量。这样就既能使农民对国家承担应尽的义务，又能使农民有一定的物质利益，以保持他们一定的生产积极性。余粮收集制的过火和没有保持一定的限度，主要问题正在于此。

更为严重的是，1920年底当战争已基本结束时，还未出现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趋向，人民群众忍耐不下去了，因而导致了1921年春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农业方面战前五年全国平均播种面积为8310万俄亩，产量为38亿普特；1920年减少为6300万俄亩和17亿普特（不足战前一半）。农业危机又引起工业危机。由于粮食和原料缺乏，大部分工厂停工、工人到农村求食或做小工甚至做投机生意。工业总产值1920年只有战前13.1%（835万卢布）。大量发行纸币的结果，使货币流通量达到天文数字，1917年7月1日至1921年7月1日，纸币流通从224亿卢布增加到23470亿卢布，44个月增加104倍，卢布贬值惊人，1921年的价值只相当于1913年的 $\frac{1}{130000}$ 。

经济危机必然带来政治危机。战争期间，农民尚能忍受“战时共产主义”，但战争结束，农民本能地起来反对这个政策。许多地区的农民，如唐波夫省、乌克兰、顿河流域、西北利亚等地的农民都发生了暴动。最典型的是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它反映了参军不久的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

情绪。列宁指出：“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1921年春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到了严重失败……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是同下层脱离的”。“农村的余粮收集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列宁全集》33卷44—45页）

在这严峻的事实面前，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痛苦、清醒、正确地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抛弃“战时共产主义”，不实行退却，“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列宁选集》4卷661页）。列宁不顾党内一些干部的反对和阻挠，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勇气正视和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坚决改正错误，率领俄共（布）和人民继续前进。1921年3月，召开了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来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拨正了革命的航向。

从“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中，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深刻的教训呢？

一、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不能搞超越历史阶段的“直接过渡”。“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列宁全集》33卷50页）那“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列宁选集》4卷661页）。如果我们企图用国家法令来消灭某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完成一些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进行直接地过渡，就会碰得头破血流，甚至会使革命失败。

二、要完成无产阶级伟大的经济任务，不能直接依靠热情，而只能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依靠经济核算”，“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列宁全集》33卷39页和51页）否则，我们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不能把农民和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

三、工业和农业之间必须建立正常的联

系，“其正确的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列宁选集》4卷517页）。联系的渠道就是商业和市场。通过市场以外的联系是要失败的。共产党人不要怕商业，不要怕做生意，应当而且必须学会做生意和管理市场。

四、正如列宁指出的：“我们应当做好有可能退却的准备，这种思想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不仅从理论上看来是如此，即使从实践上来看，凡是在不久的将来准备直接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政党，现在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保障自己退却的问题”。无论东西方国家和先进或落后国家，在吸取俄国的教训时都

“应该注意这个教训”（《列宁选集》4卷661页）。这就是说，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不要只想到进攻和走笔直的道路，要有退却思想和走曲折道路的准备。

从半个多世纪国际共运的实践来看，不是有用法令来“直接过渡”，不实行“退却”而灭亡的事例吗？不是有过过早过急否定市场不顾农民利益而使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吗？不是有在管理上不兼顾个人利益原则而使生产发展缓慢吗？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注：参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中文版321页，《复旦学报》文科版1981年1期



也谈“死去何所道”的校勘和释义

张汉清 方 彊

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引用了陶潜《挽歌》的末四句，对其中的“死去何所道”，吴海发同志作了新的校勘和释义。他根据《初学记》引《挽歌》，认为末二句应是“死去何所适，托体同山阿”，意思是“人死了，去的地方在何处？让身体埋在山野（托体），跟山陵作伴儿（同山阿）”。他觉得这样校释才连贯通顺，而部编教材第一册注解似是而非，应按《初学记》校勘。（见《关于“死去何所道”的释义与校勘》，载《天津师院学报》一九八〇年第六期）。笔者对他的新的校勘和解说不敢苟同，理由如次：

首先，从切合诗意看，应为“何所道”。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引录《挽歌》之三如下：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还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崔嵬。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诗中的“远郊”——“高坟”——“幽室”，十分

清晰地指明了死后的去所，怎么会在结束再问“死去何所适”呢？我们觉得“死去何所道”正与“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相照应，切合原诗所创设的悲凉感慨的气氛；同时用反诘的形式释义，又增强了语势和感情力量，给读者更加深刻的印象。如果易为“何所适”，不只显得平淡寡味而且与诗意乖违。

其次，从切合文意看，应为“何所道”。鲁迅的这篇文章，感情强烈而深沉。对于为了中国而死的曾是他的学生的刘和珍，鲁迅是不能已于言的。然而，现实无比黑暗，“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面对“目不忍视”的“惨象”，“耳不忍闻”的“流言”，“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呜呼，我说不出的……”这儿的“无话可说”，实际上是极度愤激之语；刘和珍等已经死了，甚至成为“饭后的谈资”，“‘流言’的种子”，还能说什么呢？它里边包含着对罪恶社会的无情谴责，以及作者的悲哀和愤慨！因此，“何所道”与文意自然接榫，而用反诘的形式释义，寄托着对刘和珍等的无尽哀思，矛头直指反动当局及帮凶文人，读者可以从中悟出象外之旨，弦外之音。如果改用“何所适”，很难收到这样的艺术效果。鲁迅是一位治学谨严的作家，《初学记》决不会没有看过，引“何所道”，不引“何所适”，决不是失误，而是经意为之的。